

## 中国早期的俄国文学思潮和文学研究

陈建华

五四以前中国对俄国文学的介绍大多为短篇简章,千字以上的文章也不多见,一般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发展及总体面貌缺乏了解,这种状况在五四时期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对此作出杰出贡献的是田汉、郑振铎、蒋光慈和瞿秋白。

田汉写于文学革命高潮来临之际的长篇论文《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sup>①</sup>,首先以其深广的内容填补了中国在俄国文学思潮研究方面的空白。论文用文言写成,长 5 万余字。文章一出现就受到评论界重视,因为“俄国文学思潮与现代思潮关系最切”,且作者又是“於俄罗斯文学思潮研讨尤力”的田汉先生。<sup>②</sup>

文章本身写得很有特色,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有些论述不尽准确,但仍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作者将俄国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文明史的大背景上加以考察。他一方面以丹纳提出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作为考察的参照系,称“文艺者,山川风物思想感情之产物。山川风物以地理而异态,思想感情以人种殊途”,俄罗斯文学所具有的“沈痛悲凉之色彩”与斯拉夫民族所处的“气寒风劲关河黯澹”的地理环境有关,而“大国产巨民”,时代又为斯拉夫民族提供了机遇,因此十九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文学“大家辈出,奇彩焕发,於文学界已执欧洲之牛耳耶”;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的联系,认为俄国斯拉夫派与西欧派分别代表欧洲数千年来延续的希伯来思想与希腊思想,“俄国近世纪来之文艺思潮史亦为此二大思想之消长史也”,俄国地处东亚西欧之间,先“受亚细亚精神之浸润”,后又“欧罗巴精神长驱直入”,斯拉夫精神受两者陶冶,故俄国文艺界才不时有“东乎西乎”之争。

从十一世纪开始至本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脉络被作者十分清楚地勾勒了出来。作者对十八世纪以前的文学作了要言不繁的介绍后,依次分析了在俄国文坛上先后出现过的拟古主义(即古典主义)、感情主义(即伤感主义)、罗曼主义(即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马尔克斯主义、象征主义等文艺思潮,并由此涉及了俄国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当然,限于篇幅和题旨,作者重点介绍的只是少数几位在思潮沿革中举足轻重的大作家。以十九世纪中期文学为例,着墨较多的作家有赫尔岑、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如赫尔岑,作家系统地介绍了他的哲学思想、文艺观点、政治活动,以及《谁之罪》等主要作品,认为他塑造的“生矣怀才至于不能不以放浪送其生”的“空人”(即多余人)形象写出了十九世纪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大可哀哉”的命运,赫尔岑本人也是这样的“十九世纪的漂泊者”,但他“虽流滴转徙,终其身无宁日,而未尝改其初志也”。又如别林斯基,作者认为别氏“以其犀利之批评造成俄国文学之社会的倾向”,他对俄国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其於俄国文坛之功绩,一方面则说明当时西欧著名创作之根本原理,一方面则评

本国文豪,纵横无尽,示作物之性质与特征,遂至开俄国近代批评文学新纪元……伯氏始发挥其威力与价值,其批评方法至于科学哲学的基础之上,又使当时文明程度尚低之人易于了解,以促进社会之自觉,鼓动社会之生机,故虽然在穷乡僻壤苟有渴仰新思想新生活者,靡不争读其评论,少壮有为之天才作者皆乐从之游,彼一方为勃施钦(即普希金)郭歌梨(即果戈理)之计释者,一方为新进作家之指导者,尽其心力,务引文学入实社会,使艺术之感化深浸润於实生活,自己亦由哲学的抽象世界投身於社会的劳动,其思想范围之阔,又足以代表一伟大之时代。……此所以为四十年代俄国近代思潮之黎明期一中枢人物也。

文章不仅对别林斯基作了较为深入的评述,而且对著名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和皮萨列夫都作了相当有分量的介绍。尽管以前有人提到过别车杜的名字,但是这样的介绍在中国还是首次出现。同样,用二千字的篇幅论及屠格涅夫的文字最早也见于此文。作者对屠格涅夫的主要作品及其艺术特色都有恰如其分的评价。如《猎人笔记》“并无结构意匠,轻描淡写,而农人性质与乡村风习之敦厚淳朴,历历如绘”;《罗亭》写俄四十年代“清淡之人,而非实行之人也”;《父与子》“则与近代思想意义最深,描写六十年代之虚无主义 Nihilism 者也”;“屠格涅夫之天才特色,即对社会大气之动摇一种敏锐之感觉,其作物对于时代精神,如镜之映物”。

田汉在介绍俄罗斯文学思潮时,有时还借题发挥,与中国五四运动前夕的社会状况和思想氛围相联系。如在谈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莫斯科大学活跃的政治小组与文学小组的活动时,作者写道:“现今我国北京大学之情形亦颇类似。自蔡元培先生留法归,主持北京大学也,少壮教授如章胡之流亦多先后自东西各国归执教鞭,于是校风丕变,燕云为之改色。教授学生之间尤尽力改良文学……甚望新时代之教师学生诸君,捐除客气,努力为学术奋斗,庶真能开新中国文艺复兴之基地。”

田汉的长篇论文开了中国对俄国文学思潮系统研究的先河,它不仅有自己的特色,而且为后来的俄国文学史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功不可没。当然,由于文章的重点放在展示思潮的沿革上,因此除极少数的几位大作家外,作家作品的论述一般都未充分展开,加之用的是文言,其影响受到一定的限制。

二十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两本系统性更强且各具特色的俄国文学史著作,一本是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商务,1924),一本是蒋光慈和瞿秋白的《俄罗斯文学》(创造社出版部,1927;泰东图书局,1929重版,改名为《俄国文学概论》)。虽说其后还有类似的著作出现,但是郑本和蒋瞿本不仅成了最能体现五四时期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水准的代表性成果,而且无疑地是解放前中国学者最重要的两部俄国文学著作。

先看郑振铎的那一本。郑本是国内最早成书的一本。郑振铎在该书序文中谈到编撰此书的缘由时称,国内至今没有一部国人写的外国国别文学史,“如果要供给中国读者社会以较完备的文学知识,这一类文学史的书籍的出版,实是刻不容缓的”。事实上,正是五四时期文坛对俄国文学的热情促成了这部著作的问世。郑本篇幅不大,正文约六万六千字,出书前曾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此书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体例严谨,脉络清晰。全书共十四章。第一章为绪言,谈“发端—地势—人种—语言”。第二章至第十三章勾勒了从民间传说与史诗到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文学发展的全貌。最后一章为“劳农俄国的新作家”(此章系瞿秋白所作),写的是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文学。在每一章中又

分若干叙述层次,如第二章“启源”分为“民间传说与史诗—史记—黑暗年代—改革的曙光—罗门诺索夫—加德邻(即叶卡捷林娜)二世—十九世纪的初年—十二月党”;第八章“戏剧文学”分为“启源—十九世纪初叶—格里薄哀杜夫(即格利鲍陀耶夫)—莫斯科剧场—阿史特洛夫斯基(即奥斯特罗夫斯基)—历史剧—同时的戏剧家—阿史特洛夫斯基以后”;第十章“政论作家与讽刺作家”分为“俄国的政论—西欧派与斯拉夫派—国外的政论作家赫尔岑—其他国外的政论作家—周尼雪夫斯基(即车尔尼雪夫斯基)与现代杂志—讽刺作家莎尔条加夫(即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另外,作为专章或俩人合章介绍的重点作家有普希金、李门托夫(即莱蒙托夫)、歌郭里(即果戈理)、屠格涅夫、龚察洛夫(即冈察洛夫)、杜恩退益夫斯基(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柴霍甫(即契诃夫)和安特列夫(即安德列耶夫)等。作为一部文学史著作,这样的编排确实基本做到了有序、清晰、全面且有所侧重的要求。

二、文字简练,颇有文采。此书的文字简洁明了,作家生平和作品分析一般均点到为止,不作大段的铺陈。不过,在这种要言不繁的叙述中也时能见到作者思想的火花与文字的光彩。如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认为他的伟大“乃在于他的博大的人道精神,乃在于他的为不齿的被侮辱的上帝之子说话。他有一个极大的发现,他开辟一片极肥沃的文学田园。他爱酒徒、爱乞丐、爱小贼,爱一切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他发现:他们的行动虽极龌龊,他们的灵魂里仍旧有烁闪的光明存在着。他遂以无限的同情,悲悯的心胸,把我们这些极轻视而不屑一顾的人类写下来,使我们觉得人的气息在这些人当中是更多的存在着”。在谈到高尔基时,作者表述道:读高尔基的短篇“情绪便立刻紧张起来,且立刻觉得惊奇不至,因为他已使我们见了从未见过的奇境与奇剧,如使我们久住城市的人登喜马拉雅最高峰,看云海与反映于雪峰之初阳;自然谁都会为之赞叹不已了!”“实在的,在一切世界的文学上,象高尔基把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境地上,描写得如此新鲜,如此特创,如此活泼,有趣,把人类感情的变幻与竞斗,分析得如此动人,如此好法,恐怕没有第二个人。”“俄国作家多带宗教气息,他则把这个气一扫而空,使我们直接与一切事物的真相打个照面。他自己置于强的方面,他绝叫生活的权利。这是他新辟的境地。当二十世纪最初,俄罗斯革命的乌云弥漫于天空时,高尔基的著作,实是夏雨者前的雷声。”作者高度评价别林斯基对俄国文学的贡献,认为“他的文字蕴蓄着美与热情,读者都能深深地受他的感动。他以他的同情,他的诚恳的精神,与一切不忠实的,骄傲的,奴隶主义的文学作品与政治思想宣战;一方面成了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一方面成了一个最好的政论作家。以后俄国的为人生的艺术的思潮的磅礴,他可以说是一个最有力的鼓动者”。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观,作者作了如下概括:“艺术自己不是目的,人生是超于艺术的;艺术的目的就在于解释人生,批评人生,对于人生表白一种意见”;“艺术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我们记起人生中有趣味的事,教导我们人是怎样生活着,及他们应该怎样生活着”。这样的评述尽管都很简单,但对于人们把握和了解俄国文学的概貌及其基本精神还是大有裨益的。

书中由瞿秋白撰写的“劳农俄国的新作家”一章,特别是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些论述也值得一提。在此以前已有关于这位作家的文字出现。1921年化鲁在《俄国的自由诗》一文(《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11期)中谈到,俄国革命后的新诗人中“最受俄国人崇敬的,便是梅耶谷夫斯基了”。这是中国最早介绍马雅可夫斯基的文字。1922年沈雁冰在文章《未来派之趋势》(《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10期)中称马雅可夫斯基是“特出的天才”,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以后,“一支锋利的笔就全为布党效力了”,他最近出版的长诗《一亿五千万》是“为抗议封锁俄国而作的”。瞿秋白在1923年8月为郑本写下的一段有关的文字:“马霞考夫斯基是革命后五年中未

来主义的健将,许多诗人之中只有他能完全迎受‘革命’;他以革命为生活”,但“作品中并不充满革命的口头禅。他在二十世纪初期已经露头角于俄国诗坛,革命以后,他们作品方才成就他的天才”;他的天才在于“他有簇新的人生观”,他“是积极的唯物派”;“他的著作,诗多而散文绝少”;“他的诗才,真足以在俄国革命后的文学史上占一很重要的地位”。瞿秋白虽然不是中国最早介绍马雅可夫斯基的人,但他却第一个见到并采访了这位作家。因此,他写下的这段文字在中国早期介绍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中就显得更有力度和弥足珍贵了。

三、书目完备,资料翔实。郑振铎该书在正文后还有两项附录:《俄国文学年表》和《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者,其列举书目之详,实属难得。在介绍书籍之前,作者还写下了一段颇为生动的引言:“俄国文学的研究,半世纪来,在世界各处才开始努力,他们之研究俄国文学,正如新辟一扇向海之窗,由那窗里,可以看出向来没有梦见的美丽的朝晖,蔚蓝的海天,壮阔澎湃的波涛,于是不期然而然的大众都拥挤到这个窗口,来看这第一次发现的奇景。美国与日本都次第的加入这个群众之中,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因素来与外界很隔膜之故,在最近的三四年间才得到这个发现的消息,才很激动的也加入去赞赏这个风光。但因加入得太晚之故,这个美景,却未能使我们一般人都去观览。现在我在此且介绍几十本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书,聊且当做这美学(景)的一种模糊的影片。至于要完全领略那海上的晨曦暮霭与风涛变幻的奇观,则非躬亲跑到海边去不可,……”

书中分三类对有关书籍作了介绍。第一类为“一般的研究”,共列出文学史的和理论方面的书籍 29 部,其中英文的有 26 部,日文的 2 部,中文的 1 部。作者对每本书都有提纲契领的说明。如称巴林(即前文提到的贝灵)的著作“叙述很简明,初次研究俄国文学的人,这本书是必须看的”;称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是一部不朽的作品”,“从古代民间文学到最近的作家,都有明晰而同情的叙述”;称二部日文著作的作者昇曙梦“为日本现代最著名的俄国文学研究者。日本现代文学极受俄国文学的影响昇曙梦于此是有很伟大的功绩的”,他的《露国(即俄国)现代之思潮及文学》“实为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他的《露国近代文艺思想史》“是一部研究俄国近代文艺思潮的极重要的书。这类书,这英文里几乎绝无仅有”。关于《小说月报》1921 年十二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文中介绍道:“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一部系统的研究俄国文学的专书,此书可算是这一类书中的第一部。内容除译丛、附录之外,其有论文二十篇,读之略可窥见俄国文学的一斑。”第二类和第三类都是介绍作品的,分别为“英译的俄国重要作品”和“中译的俄国文学名著”。前者列举了 20 种集子或丛书,后者排出了 28 种中译的有关作品。这三类书籍的介绍为当时的读者作了很好的导引,是此书最有价值的方面之一。也许正是基于上述优点,评论界对郑振铎的这本《俄国文学史略》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王统照在《晨报副镌》上撰文称此书“能用页数不极多的本子,将俄国文学的历史上的变迁,以及重要作家的风格、思想,有梗概的叙述。可谓近来论俄国文学的最好的小册子。”

不过,作为早期的俄国文学史读物,郑本存在的不足也是明显的。比较突出的是该书编译成分较多,不少地明显借用了克鲁泡特金和贝灵等人所撰著作的观点,虽然由于作者能博采众长,在他人的观点上有所生发,但与一部独立的研究著作相比似有一定的差距。同时,因篇幅较小,内容显得有些单薄,特别是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大多过简,重点作家往往也仅有千余字,令人产生意犹未尽之感。而且有些重要作品作者显然尚未接触,故出现不应有的错误,如在谈到《战争与和平》一作的主人公时,称“乃是一个朴讷的农人白拉顿(即普拉东)”,而毫不提及彼埃尔、安德列、娜达莎这些人及其命运。而从对高尔基在 1905 年到 1917 年间的作品的不尽恰当的评

论中又能见到苏联早期极“左”思潮的影响。此外,有些作家作品的译名因据英文译音转译,因而与原文显出较大的差距。

由蒋光慈编成、蒋光慈和瞿秋白合著的《俄罗斯文学》,出书时间虽晚于郑本,但其意义与价值均不在郑本之下。蒋瞿本共11万字,分上下两卷。上卷为蒋光慈所作,名为《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约5万3千字;下卷为瞿秋白所作,名为《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约5万7千字。蒋光慈在书前有个简短的说明:其一是他觉得“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比较重要而且对于读者有兴趣些”,因此将上下卷的前后位置颠倒了一下;其二是说明下卷用的是屈维它君(即瞿秋白)的稿子,但征得原作者同意后作了删改。这里我们对下卷和上卷分别作些分析。

如果不计瞿秋白写的第十四章,那么郑振铎所写的那本文学史与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蒋瞿本被删改的下卷(原稿已无法觅见)篇幅相近。也就是说,瞿秋白与郑振铎一样用不多的文字描述了十月革命以前的俄罗斯文学的面貌。据史料记载,瞿秋白原稿作于他旅俄期间,大致在1921至1922年间,因此写作时间估计要早于郑本,可惜因故未能及时出版。与郑本相比,两者在分析文学现象时都注意与社会现象相联系这点上是一致的,而在体例和文字等方面则各有所长。瞿作语调平实,内容简明,论述相对集中,对重点作家和作品的分析有所加强。如关于普希金部分,瞿作比郑本的文字增加了一倍。同时,瞿作由于写于俄罗斯,作者本人又通晓俄语,因此论述的准确性得以加强。如同样是谈《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瞿作写的是“最可注意的便是这小说里的‘幻想的哲学家’彼埃尔”。

与上述因素相联系的是,瞿作中更能见到有创见的文字。如对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和“新人”形象,虽然早有人提到,但是还没有人能象瞿秋白那样作出如此深入的理论分析的。瞿作中谈到当时俄国知识界的通病所谓“多余的人”时写道:“‘多余的人’大概都不能实践,只会空谈,其实这些人的确是很好的公民,是想做而不能做的英雄。这亦是过渡时代青黄不接期间的当然现象。他们的弱点当然亦非常显著:这一类的英雄绝对不知道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人;加入现实的生活的斗争,他们的能力却不十分够。幼时的习惯入人很深,成年的理智每每难于战胜,——他们于是成了矛盾的人。”作者对屠格涅夫作品中的罗亭和拉夫列茨基等形象分别作了分析,而后继续写道:“俄国文学里向来称这些人是‘多余的’;说他们实际上不能有益于社会。其实也有些不公平;他们的思想确是俄国社会意识发展中的过程所不能免的:从不顾社会到思念社会;此后才有实行。——他们的心灵的矛盾性却不许他们再前进了;留着已开始的事业给下一辈的人呵。”

作者接着又对被后来的文学史视作“新人”的巴扎罗夫形象与其前辈的联系,以及他自身的内在矛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前辈和后辈的思想界限,往往如此深刻,好象是面面相反的,——实际上呢,如《父与子》里的‘英雄’巴扎罗夫等,虽然也是些‘多余的人’,却是社会的意识之流里的两端而已。”“巴扎罗夫以为凡是前辈所尊崇所创立的东西,一概都应当否认:对于艺术的爱戴,家庭生活,自然景物的赏鉴,社会的形式,宗教的感情——一切都是非科学的。然而他的实际生活里往往发出很深刻的感情;足见他心灵内部的矛盾:——理论上这些事对于他都是‘浪漫主义’。屠格涅夫看见巴扎罗夫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社会的人生观突变的时候所不能免的。然而巴扎罗夫之严正的科学态度,性情的直爽而没有做作,实际事业方面的努力,——都是六十年代青年的精神。”这样的理论分析显然是建立在对作家及其笔下的艺术形象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

又如瞿作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与旧文学》一章中,对安德列耶夫的创作也作了如下精到的

分析：“安德列叶夫纯纯粹粹是近代主义者，他的作品当时被称为‘文学的梦魇’，悲惨，暗淡，沉闷；他的小说和剧本里的人物的动作，好象是阴影，——那阴影还大半在浓雾里呢。他的题材实在是人类互相的不了解，不亲热，——残酷的孤寂。”在谈了安德列耶夫的创作与尼采哲学的关系后，他又写道：“安德列叶夫的文心比西欧象征主义更加孤寂：易卜生和梅德林克的人物还有凌驾尘俗的个性；安德列叶夫的却只是抑遏不舒的气息。”作者抓住了安德列耶夫的创作，特别是中后期创作的特色，其视野也相当开阔。

当然，作为早期的文学史著作，郑本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在瞿作中也有所表现，特别是史实的叙述和作家作品的分析大多仍“简单概括得很”<sup>④</sup>，而在对高尔基的评论中也同样出现了受苏联早期极“左”思潮影响的痕迹，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能达到郑本和瞿作的水准已实为不易。

这里还要谈谈蒋瞿本的上卷，即蒋光慈撰写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蒋光慈与瞿秋白有某些相似的经历，他也曾于二十年代初期赴俄罗斯学习，这本书的初稿也写于这一时期。由于蒋作切入的是俄罗斯当代的，即十月革命后若干年里所发生的种种文学现象，因此内容新颖独到，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蒋作是中国人写的唯一的当代新俄文学史。为了便于真切地了解蒋作的基本内容，可以看看其章目。该书的上卷其九章，分别为“死去的情绪”（谈旧俄诗人在十月革命后的命运）、“革命与罗曼谛克——布洛克”、“节木央·白德内宜”（即杰米扬·别德内依）、“爱莲堡”（即爱伦堡）、“叶贤林”（即叶赛宁）、“谢拉皮昂克弟——革命的同伴者”、“十月的花”（谈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吉洪诺夫等新一代诗人）、“无产阶级诗人”和“未来主义与马牙可夫斯基”。不用细述其内容，据此已可看出蒋作为当时中国文坛提供的是崭新的而且又是迫切想了解的新俄文学的总体面貌和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其价值不容低估。

作为一个热情的昂奋的诗人和十月革命的热烈的拥护者，蒋作的风格与瞿作和郑本均不同，字里行间充满着诗一般的语言和勃发的激情。如他在第七章中这样赞美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代新诗人：“红色的十月里曾与我们不少的天才的青年诗人。这些青年人，他们为红色的十月所涌出，因之他们的血肉都是与革命有关连的——革命是他们的母亲。他们的特点是：他们如初春的初开放的花朵一样，既毫不沾染着一点旧的灰尘与污秽，纯洁得如明珠一样，而又蓬勃地吐着有希望的，令人沉醉于新的怀抱里的馨香，毫不感觉到凋残的腐败的意味。”“‘我们是地上暴动的忠臣’，是的，基抗诺夫（即吉洪诺夫）是新的苏维埃的俄罗斯的忠臣。新的苏维埃的俄罗斯，是强有力的，无神甫的，列宁的俄罗斯，惟有此俄罗斯才是人类的祖国。我们爱此俄罗斯，我们不得不爱此俄罗斯的歌者。”

蒋光慈完全是站在革命诗人的立场上来考察新俄文学现象的，他在介绍文学现象时常常作出自己的评价。如他在谈到革命与罗曼谛克时写道：“无产阶级也爱百合花的娇艳，但要使大家都有赏玩的机会；夜莺的歌唱固然美妙，但无产阶级不愿美妙的歌唱，仅为一二少数人所享受。许多很好的诗人以为革命的胜利，将消灭一切幻想和一切罗曼主义，其实人类的一切本能绝不因革命而消灭，不过它们将被利用着，以完成新的责任，新的为历史所提出的使命。”又如他给予擅长写革命鼓动诗的别德内依以很高的评价，认为“普希金是俄国第一个伟大的天才的诗人，我们可以说白德内依是他最好的学生，但是白德内宜诗中所含蓄的民众的意义，任你普希金也罢，列尔芒托夫（即莱蒙托夫）也罢，布洛克也罢，马牙可夫斯基也罢，都是没有的。”这一类的评价有的可能出于苏俄批评家的观点，也有的则发自作为革命诗人的蒋光慈本人的心胸。

在蒋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缺憾。也许是因为贴得太近的缘故，蒋作将大部分篇幅给了诗歌，而对其他的文学样式评述得过少；

（下转第 99 页）

- ⑥A. Macclish: To Mr. Rosset, see *Lady Chatterley's Lover*, Grove Press, P6.
- ⑦⑧⑨D. H. Lawrence: *Lady Chatterley's Lover*, Grove Press, P204, P213, P278
- ⑩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 P196。
- ⑪艾弗·埃文斯:《英国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P313。
- ⑫吉茜·钱伯斯:《一份私人档案》,上海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 P313。
- ⑬D. H. Lawrence: *Lady Chatterley's Lover*, Grove Press, P171。
- ⑭Mark Schorer: Introduction to *Lady Chatterley's Lover*, Grove Press, P24~25。
- ⑮《劳伦斯书信选》,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 P58。
- ⑯D. H. Lawrence: *The Rainbow*, Penguin Books 1981, P495~496。
- ⑰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 P214。
- ⑱D. H. Lawrence: *Study of Thomas Hardy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27。
- ⑲C. H. 劳伦斯:《我们彼此需要》、《性与可爱——劳伦斯散文选》花城出版社 1988 年版, P145。
- ⑳㉑㉒《劳伦斯书信选》,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 P561, P578, P543。
- ㉓D. H. Lawrence: *Lady Chatterley's Lover*, Grove Press, P229。
- ㉔劳伦斯:《性与可爱》、《劳伦斯散文选》花城版, P106。
- ㉕劳伦斯:《色情与淫秽》、《劳伦斯散文选》花城版, P124。
- ㉖㉗㉘D. H. Lawrence: *Lady Chatterley's Lover*, Grove Press, P174~175, P238, P312。
- ㉙参阅张健:《三种性爱境界》、《环球文学》1959 年第三期 P39。
- ㉚《劳伦斯书信选》,北方文艺出版社, P63。
- ㉛㉜弗克默德:《劳伦斯》三联书店 1989 年版, P188。
- ㉝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第二卷, P224。
- ㉞㉟劳伦斯:《巴黎来鸿》、《性与可爱——劳伦斯散文选》花城版, P297, P296。
- ㊱㊲㊳㊴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第二卷, P227, P227, P235, P234, P237。
- ㊵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恩文选》第二卷, P26。
- ㊶《影朦胧——劳伦斯诗选》,花城版, P181。

(上接第 91 页)

也许是因为贴得太近的缘故,蒋作史的意味有所淡化;也许是因为受情感和语言诗化的影响,蒋作叙述的严整性似有不足;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还能看到“拉普”思潮的影子,如作者谈到了无产阶级诗人的四个方面的特质,其中强调的一点是:“他们都是集体主义者 Collectivists,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只看见‘我们’,而很少看见这个‘我’来。他们是集体主义的歌者。……这个‘我’在无产阶级诗人的目光中,不过是集体的一分子或附属物而已。”这些观点后来越来越多地被介绍过来,对中国正处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文学产生过不利的影响,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论及。

然而,这些缺憾毕竟不是主要的,与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一样,蒋光慈和瞿秋白合著的《俄罗斯文学》一书的历史作用也是不可磨灭的。

①《民铎》第一卷 1919 年第 6、7 号连载。

②见该文编者按。

③蒋光慈:《〈俄罗斯文学〉书前》。